

編後語

在當代中國歷史上，1989年是一個大轉折，它有點類似俄國的1905年或中國的1898年。本期「二十一世紀評論」的主題，就是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各方面的變化。陳懷林的文章借助西方經濟史學的制度創新理論，以當代中國傳媒制度發展變遷為背景，詳細分析了大陸傳媒業體制在日益膨脹的市場利益驅動下，從宣傳部門逐漸變為國有信息產業的艱難過渡。他同時指出，在現有政治體制架構中，傳媒的制度創新空間是有限的。陶東風檢討了中國思想界從80年代熱烈地呼喚現代化，到90年代反思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性的歷史過程，重點評論了近十年來的三種思潮：中國版的「後學」、世界體系理論，和最有爭議的「新左派」進路。汪丁丁則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對中國的90年代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思考。他認為，當代中國經濟面臨着三個重要問題：利潤權利的合法性基礎、勞動與資本間經濟關係的合法性基礎，和政府身份及其合法性問題，並進而提出自由主義在中國現實的困境和出路。另外，在「經濟與社會」欄中，李路路通過對私營企業近十年變化的實證研究，分析了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變遷。他指出，中國目前並存的再分配經濟和市場經濟這兩種體制，如果無法再混合下去時，漸進改革就可能被激進改革所替代。

在歷史上，有些事件是不能也不應該忘卻的。「人文天地」欄目中，吳言描述在1926年「三一八」慘案以後中國知識份子的沉重心理，再次提醒讀者不能遺忘那段血寫的歷史。程映虹研究了二十多年前紅色高棉的大屠殺，指出這一滅絕人性的行為是以社會重建的崇高名義進行的。

本期的「百年中國」是另一組有關五四研究的論文，相關的還有周昌龍的文章，他詳細分析了五四時期胡適對傳統禮教的矛盾態度。「景觀」欄高名潞的文章從全球現代化角度分析了大陸、台灣和香港現代藝術的特點，既有理論概括，又有具體作品評介。張隆溪在「批評與回應」欄對上期發表的于連訪談提出了不同看法，指出西方學界某些人，甚至如福柯對中國文化的嚴重誤解，並由此談到中西方文化的差異。

在「讀書：評論與思考」欄中，高華從史料考證和理解的層面，對陳永發的新著《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》提出批評；王倪則對近兩年在大陸出版的若干重要譯著發表了坦率意見。兩位作者的觀點自然見仁見智，可以繼續討論；而王振忠等的一組書介與短評也都各有見地，值得一讀。書評和書介都是嚴肅而有重要意義的學術工作，我們切望得到更多作者支持，為建立認真的學術書評規範而共同努力。